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我的中國心

——从台湾归来

• 4 •

仲荃 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我的中国心

——从台湾归来

• 4 •

仲 荃 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编入黄植诚、于善钧、叶庆耀、侯德健、黄益腾（阿原）、陈尝经等一批台湾同胞，向往光明，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归祖国大陆的感人事迹。

台湾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大陆和台湾居住的都是“龙的传人”，都有一颗中国心。三十多年来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本书介绍的台湾同胞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充分展示出台湾人民的共同心声。它再一次告诉人们，爱祖国，渴望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台湾回归祖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祖国统一为期不远。本书选材广泛，事迹生动感人，对青年具有教育意义。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我 的 中 国 心

——从台湾归来

• 4 •

仲 芸 编

*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81,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71册

统一书号：7376·6 定价：0.75元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胡乔木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要我为《我的中国心》丛书写几句话。我很愿意接受这个光荣的委托，因为我不但同书中的人物一样有一颗中国心，还同本书的编者、读者一样有一颗青年心。

《我的中国心》是一套由六个分册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它选辑了科学工作者、华侨、由台湾回大陆的人士、支援边疆建设的同志以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外友人的先进事迹，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不倦奋斗、做出贡献的人们，今天在各条战线上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们，何止千万。各大洲的国外友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人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以至生命。他们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感激和尊敬。以多样的形式、丰富的色彩、饱满的激情如实地写下他们的先进事迹，塑造他们的光辉形象，从而激发当

11/32/05

代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大革命热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顽强地学习和工作，勇敢地献出自己的一生——这正是我们的编辑、出版、新闻以及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洋溢在本丛书各篇中的，是深挚强烈的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几度面临严重的外敌入侵而绝不屈服，这一切让人们痛苦悲愤又催人振奋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正是由中国人民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用自己的泪和血写出来的。在敌人的屠刀、枪口面前视死如归，深信祖国的生存、利益和荣誉高于个人的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我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人是这种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的爱国主义摇篮中成长，并且在革命实践中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团结人民大众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顽强奋斗，战胜了一切内外敌人和种种难于想象的困难。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无论经受多大的挫折和牺牲，我们党始终战斗着，前进着，直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不但同爱国主义相对立，而且正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发展。

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推动我们取得过去胜利的精神动力，而且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的精神动力。坚持党的领导，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当今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同志说过，“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

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邓小平文选》第347页）在对外开放、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中，坚持民族自信、自尊，是爱国主义在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做亡国奴的屈辱；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先烈们为民族独立而流下的鲜血；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那些支持中国进步事业、革命事业的外国朋友流下的鲜血和所作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过，“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誓言，也是每一个爱国公民的神圣义务和责任。以热爱祖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全部力量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做一个中国人的起码的道德。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有志气的。穷的时候有骨气、有志气，在改变贫穷面貌而进行的奋斗中，以至在逐步富裕以后，同样也有骨气、有志气。本书第二册介绍了几位我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情况。当他们取得成绩以后，在荣誉、物质和其他种种优越条件的诱惑面前，毫不动摇，坚定地回答：“我的祖国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是华夏子孙”。外国朋友从这些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中认识到：“‘祖国’这个词不仅可以从字典中查到，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心灵上找到”，“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保持和发扬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让它一代一代在中华民族子孙的心上深深地扎根，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在各方面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崇高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趁这个机会，我愿向本书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向一切辛勤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的同志，向所有支持过和正在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外国友人，表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感谢和敬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驾机归来一席谈.....	(1)
他从海峡那边来.....	(19)
——访辽宁大学物理系教授于善钧	
火的追求	(22)
——记副研究员叶庆耀	
生命的三分之一.....	(31)
阿原归来记	(58)
马璧访问记	(67)
理想的力量	(77)
——记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周朗	
思归当归 苦尽甜来.....	(82)
——访从台湾归来与亲人团聚的张愚非先生	
回归三步曲	(88)
——访白少帆先生	
中国心	(95)
——记从台湾归来的企业家陈尝经	
祖国啊, 台湾儿女想念您	(112)
——张金海先生从台湾归来记	
今日彩云归	(118)

冲破海峡的浓雾..... (131)

叶落归根 (140)

——访从台湾回归故里的傅文秀先生

骨肉要团圆 (153)

——访从台湾归来的青年工人张新民

驾机归来一席谈

黄植诚 口述

王培公 整理

“凌云御风去，报国把志伸。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滨。……”这支国民党空军的“军歌”，我唱了许多年了。但是，只有在我毅然驾机归来、投身人民空军行列的今天，才真正实现了遨游昆仑、立志报国的夙愿。

据说，我驾机归来以后，台湾当局曾以“无回归之可信动机”为理由，矢口否认我这一举动是出于自愿。国外有些人也在困惑：黄植诚亲人都都在台湾，自己前程远大、生活优裕，他为什么要舍弃这一切回大陆呢？

的确，这里似乎有一个谜。我祖籍广西，但我生于台湾，长于台湾，我的母亲已是满头银发，姐姐、哥哥们也都在台湾。我，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受过七个机种训练，飞行达2170小时，技术优良，职务及军阶升迁也不落后于人。我平日与长官、同事们相处不错，尤其在桃园机场一些年轻飞行官里，“彼得”（大家对我的昵称）可以说是他们仿效的榜样，有人开玩笑封我是“光棍头儿”（因我尚未成家）。我自己有装空调的房子、有自己的“飞雅特”牌轿车……

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一切，飞回大陆来呢？因为我毕竟是个有头脑、有理想的中国青年。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观念很强的人，那一切又怎能成为他走上报国之路的障碍呢？

小时候，我读过一部小说，还记得开头几句：“在这坎坷的人生旅途中，我跌倒了，我站了起来；我不断地跌倒，我不断地站了起来。……”我在二十九岁时所做的这个重大抉择，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思考和追求……

“长大了，干大事！”

我生长在一个“空军世家”。父亲黄汝森，原是运输机飞行员。1949年，他飞到台湾，从此，我们家就定居在台湾省冈山县。我就是1952年1月3日在冈山出生的。

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几乎什么也没留下，我不到四岁他就病故了。撇下我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大的正上高中，最小的我还在牙牙学语，在人地两生的台湾，日子怎么过啊！有人劝她让我大哥退学做工，还有好心的叔叔要接济我们，我母亲都摇摇头，谢绝了。她用单弱的双肩把生活的重担一个人挑了起来。

母亲叫董素芳，四川成都市人，今年六十二岁。当年，她还不到四十岁，就抛头露面去做小贩卖菜。这在当时的台湾，作为一个军队眷属是少有的。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做好饭菜，再把大一些的孩子叫起，帮忙把收来的鲜菜装好，骑上我父亲留下的那辆吱吱作响的破单车，赶二十分钟路运到市场，这时天才刚放亮呢。我小，帮不上忙，大哥快考大学了，妈妈也不肯叫他，干活最多的就是我那孝顺的二哥植坚和姐姐植芬。直到我大哥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我都上高中了，妈妈才不再卖菜，但仍是那样整日为我们操劳，后来又

为我哥哥、姐姐的下一代操劳……她老人家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性！我说她了不起，是因为她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俭朴、贤淑、慈爱；也因为是她最早启迪了我：要有自立、奋发的精神，要有骨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矢志不移，挺起腰杆……

我小时候很顽皮。五岁上冈山空军子弟小学，十一岁上县立冈山中学，当时虽然矮小、瘦弱，但常和同学打架。在上初中的时候，有次放学后，我骑单车回家，见一位同学被人围攻，我把车一停就冲上去，结果嘴唇被打破了，牙也被打裂开了，不敢回家，躲到同学家里去。家里和学校到处找我。快九点了，我才到家。我大哥黄植榕又着腰站在门口，见我捂着嘴回来，问：“哪里去了？”我说：“被人家打了。”他眼一瞪说：“你被打了？我还要打你呢！”幸亏妈妈看见了我滴血的嘴，她哭着把大哥拉住，赶快带我去医院，缝了好几针，到现在这儿还留下个明显的疤痕。

大哥其实是很喜欢我的。只是因为父亲死得太早，他不能不负起长子的责任，对弟、妹严加管束，替母亲分忧。父亲的死，使他个性变得很拘谨，到现在当了土木工程师，还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进豪华的饭店和娱乐场所，在现今台湾的上层社会，算是少见的正派人。那时我们做弟妹的都怕他，尤其是我，因为他说打就打，毫不留情。有次我上学迟到，老师罚我站在门口，我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扭头就跑，结果因“不敬师长”，被记了两个过（记三个过就要开除了）。我大哥知道后气坏了，趁我母亲不在家，把我捆在院子里的树上，用藤条抽打，边打边训，我哭，他也流泪，但他

到底也没把我被记过的事情告诉妈妈，怕她老人家伤心。到现在大哥还常说我是“打出来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与母亲的苦心。母亲常教育我要做个诚实、正直的人，要“立大志，办大事”。慢慢地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到高中，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我也开始读课外书，最佩服那些身处逆境而奋斗不息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越王勾践，还有我大哥最崇拜的郑成功。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家门前，晚饭后，我大哥怎样在松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起“国姓爷”（郑成功的尊称）渡海赶走“红毛鬼子”、收复台湾的故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要奋斗！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就要象郑成功那样！

“咬着牙，飞出来！”

决定一生命运的时刻到了！1969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立刻就决定了奋斗的方向：投考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空军官校）。

官校校址就在我们冈山。当时，国民党空军有个以飞行技术高超闻名的“雷虎小组”，常来冈山为外宾、侨胞作特技飞行表演。我和二哥常坐在自家院墙的墙头上出神地观看，想象自己也插翅飞上了天空。高中毕业，看到许多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职业，而官校一毕业就是中尉飞行官，待遇好，有发展，再说，穿着上蓝下白、袖上镶金线的官校制服在街上一走，也很神气，连女孩子都多看几眼呢。所以毫不犹豫报考

了,而且考上了。那年我们学校有三名学生考进了空军官校,最后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

什么原因呢?因为官校的办法是仿照美国的西点军校,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有些严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有身体不适应的,也有吃不了苦、受不了约束的,就被淘汰了。

未入校,先来个“下马威”,集中在陆军官校受训三月。那不叫受训,简直叫受罪。比如洗澡吧,规定你在一支歌的时间里必须洗完。至于放哪首歌,就看教官们的兴高了。最短的歌只有三分钟,在那三分钟里,你要脱衣服,冲洗,打肥皂,再冲净擦干,穿上衣服。这哪象洗澡,象打仗!因此大家都叫它“三分钟战斗澡”。一进浴室就神经紧张,因为只要唱片一完,哨子一响,没洗完的就要挨训受罚。

到了空军官校,心想可以喘口气了吧?不行,空军有空军的规矩,一切重新来!步子要重新走,规定要重新学,稍不注意就要受罚。官校四个年级,一年级最难熬,因为那些高年级学生全是你的“学长”,都有权罚你(这叫“学长制”)。走路不走直角要罚,敬礼慢了要罚,连吃饭碰响了碗都要罚。官校有个大饭厅,八百人一起开饭,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响声。因为一桌四个人,一、二、三、四年级各一个,互相监督着。桌面是铝制的,凳子也是铝的,第一年完全是夹着两臂吃饭。万一不当心弄出响声,自己要主动罚站一分钟,如果不自觉,同桌的高年级学生喊一声“同学,站好”,要你站在哪里你就得站在那里,常常是命令你站在凳子上,甚至桌子上。罚站还是轻的,我就曾因抽烟被罚剃过光

头，吃饭时一脱帽，嗨，八百双眼睛都看着你，所有人都知道你犯了过失，那种滋味比当年老师罚我在课堂门口站一下可难受多了，但是我再也不敢耍脾气了，我得拚命忍着！因为我不想被开除，我想飞！

不光是行动上要绝对服从，说话也得十分小心。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和几个同学议论起学校的一条规定太不合理，当时大家也都附和。可过了几天，长官把我叫去问话了，原来是有人打了“小报告”！这一次，罚我站在装满水的盆子里，背着枪，戴上钢盔，全付武装，还穿上又厚又笨的雨衣，在太阳下面站两个小时，又闷又热，头晕眼花，我也只有咬着牙忍着。就这样，官校四年，我从一个外在性格的人逐渐变得内向，不管心里有什么，能控制自己不再随便表露出来。大家都说我深沉了，象个标准的军人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这次驾机归来，准备了两、三个月而一切亲友都没看出来，还真要归功于官校的严格训练呢。

终于，在我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学飞行了。那年我正好二十岁。二十岁，是一个台湾青年脱离父母监护、长大成人的年龄。我在这个时候飞上了天，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象着了迷似的爱上了飞行。当时我的教官姓陈，对我很关心，教得也耐心，当我在空中紧张时，他甚至用哼几句歌的办法来解除我的精神负担，所以我飞得很顺利，第一个放了单飞。当时分A、B两班，我一直是在A班。飞得正带劲，偏偏给我换了个新教官。这新教官姓冯，年纪轻，要求严，火气也大，从来不见他的笑脸。他带飞回来，我照例要去接飞机。如果他什么都不讲，我就松口气，如果他气哼哼把背的

伞包一丢就走，我心里也就象是扔进了一块石头：糟了，肯定挨骂！他当面骂我们，我们背地里起外号骂他。但有一次飞夜航，我重感冒住了院，心里急得要命，怕拉下科目毕不了业。没想到，这天夜里十点多钟，刚飞完夜航的冯教官用摩托带着另一位同学看我来了！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听着他安慰我的话语，第一次感到他是那样慈祥。由于有这些严师，也由于自己的一番奋斗，我终于学完四年课程，以优异的成绩从官校毕业了。

“要打仗，和谁打？”

1973年初，我正式分到了部队，驻桃园机场。

桃园机场最靠近台北，号称亚洲最大的“中正国际机场”也在这儿，位置重要，条件好，名气也响，是毕业学员们梦寐以求的地方。那期分到这里的毕业学员只有两名，我是其中之一。可见上面对我还是很器重的。不久，我大哥在台北市秀廊路买下幢房子，三间一厅，把妈妈接了来，我家就算搬到了台北市。冈山老家就剩下还在空军官校任军粮分队长的二哥了。

我那年二十一岁，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特别听长官说桃园这个部队“曾接受过总统的荣誉旗，有辉煌的记录”，更是指望施展抱负，大干一番。但是，兜头一瓢凉水：原计划改装的F—5A飞不成了，改为飞T—38。原因是美国把台湾的F—5A都弄到越南去打仗了。当然T—38也是性能非常好的一种飞机，是我飞过的几种飞机里驾驶最顺手的一种，但

它是高级教练机，不能作战。美国在越南停火后，撤回飞机，我们才又飞上F—5A。这件事给我很大刺激：原来飞什么飞机都要看美国的脸色呀！

时间一长，更清楚了。美国给台湾的都是些旧飞机。美国有新的，但就是不卖给你。美国批F—16卖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换下F—104，卖给台湾。

当时正赶上中美建交，台湾的舆论界吵得天翻地覆，一般人也气得骂美国“背信弃义”，特别是有些青年，简直捶胸顿足。可捶胸顿足之后呢？一点办法都没有。美国该同大陆来往还照样来往，台湾只有发发牢骚的份儿。

我这个人喜欢动脑子，到了作战部队，当然要研究自己的作战对象，研究双方的军事实力和态势。这一研究，问题来了。我发现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大陆有那么多的机场，那么多的飞机，而且自己能生产战斗机！回头看台湾，就那么一点人家施舍的旧飞机，说句不好听的话，大陆一个机场摆一架也摆不满呀！还有什么打头？

我真感到泄气。有次，总部一位中将来给大家训话，不知怎么就讲起我们这些年轻的飞行员来了。他把我们训了一番，什么“不知足”啊，“想入非非”啊，还大谈什么“当年我们在大陆跟共产党打仗，穿着草鞋，拿着三八枪”如何如何。我越听越火，早已藏起来的那种倔劲又冒了。“报告长官！”又站起来反驳说：“希望长官不要光谈过去。时代已经发展了，现在怎么办嘛！总不能让我们再穿草鞋、拿着三八枪去同共产党作战吧！”气得中将脸色发青，扭头便走。那一次要不是上峰说情，险些停我的飞。